

## 黃世仲生平考辨二題

郭 天 祥

**摘 要** 黃世仲寫小說《大馬扁》丑化康有爲，並非如有人所說是因爲黃、康早年曾爲同學且積怨甚深之故，而純屬政見不同使然；黃世仲在南洋加入革命組織中和堂的時間也不是很多人所說的1901年，而是1902年初冬。

**關鍵詞** 黃世仲 生平 考辨

晚清革命派小說家的代表人物黃世仲（1872-1912），生平著有《洪秀全演義》等小說20余部，在中國小說史上占有重要地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外學術刊物發表過不少研究黃世仲其人及其作品的論文。但我們在從事黃世仲專題研究中發現，一些論著講黃世仲生平多有錯誤，以訛傳訛之處亦時有所見。而這些訛誤，謬種流傳，勢必會影響到對黃世仲作品的研究與評價，不可不辨。現就兩個比較典型且比較重要的問題辨證如下。

### 一、與康有爲、梁啓超是否有同學關係

晚清小說研究的先驅楊世驥，在1945年出版的《文苑談往》第1集《黃世仲》一文里說：世仲“年十六，從南海朱次崎（應作“琦”，楊誤）受學。他和康有爲既屬通家，又有同門之雅，而兩人性情皆極詭誕，不相融洽，常因細故發生斗毆，日后彼此政見更復不同，以致勢如水火”。楊氏所言，大多雖非事實，但因發表時間早，影響很大，誤導了不少學人。如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1、錢仲聯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黃世仲”條\*2、六省市十一院校合編《中國文學簡史》（下冊）\*3等，大都不同程度地沿用了楊世驥的說法。不僅如此，楊世驥還把黃世仲著文痛斥康有爲力主“保皇立憲”的政見書、寫作丑化康有爲形象的小說《大馬扁》（馬扁之合體

爲“騙”字，大馬扁即大騙子），揭露、反擊康梁保皇黨人在海外的保皇欺騙活動，解釋爲“既有前嫌，又爲政敵”，所以才會“蓄意毀謗”<sup>\*4</sup>。更是錯上加錯。

究竟黃世仲與康有爲有沒有一起在嶺南大儒朱次琦（人稱九江先生）門下受學呢？只要查考一下此三人的生卒年，問題很容易搞清楚。據《康南海自編年譜》，康氏生於1858年，其師從九江先生受學，事在光緒二年（1876）至光緒四年（1878），那時康氏已年屆弱冠（18-20歲）；考之《黃世仲年譜長編》，黃氏生於1872年<sup>\*5</sup>。當康有爲在九江先生門下受學之時，黃世仲還是個學前孩童（4-6歲），兩個人怎麼可能會有同學的緣分呢？既非同學，所謂康黃同學期間，“不相融洽，常因細故發生斗毆”云云，也就是絕無可能的事情了。那麼，黃世仲十六歲前后有沒有在九江門下受學呢？看來也沒有可能。因爲據九江先生得意門生簡朝亮編撰的《朱九江先生年譜》、清宣統《南海縣志》卷14《朱次琦傳》記載<sup>\*6</sup>，九江先生在黃世仲十歲那年，即光緒七年臘月（1882年初）就病逝了。這樣看來，所謂世仲“年十六，從南海朱次琦受學”，也是根本不可能的。

通過以上考辨，我們可以確切地知道：黃世仲與康有爲既沒有同學關係，也不會有“同門之雅”的因緣。因此，1903年，康有爲“發表排斥仇滿政見書”，黃世仲在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爲文予以痛駁”<sup>\*7</sup>；1908年，黃世仲在日本出版揭露康有爲保皇騙局、丑化康有爲形象的小說《大馬扁》等反康舉動，純屬晚清時期以孫中山爲首的革命派同以康梁爲首的保皇派的對立和鬥爭，是政治立場、政治理想衝突使然，與個人恩怨並無關涉。

雖然黃世仲與康有爲沒有同學關係，但黃世仲與康有爲的大弟子梁啓超（1873-1929）却有同窗之誼。關於這件事，1903年3月25日，黃世仲本人在新加坡《天南新報》發表的《論張之洞之禁新民叢報》一文中提到了。他說：“某與《新民叢報》記者，向同受業於陳梅坪（“坪”或作“房”，誤）先生之門。自后天各一方，我在西時他已北，我到南時他又東。以故十余年來未曾一談，未通一問。雖所謀各異，志向亦殊，然而文字神通，猶得於報紙中觀其言論宗旨”。也許有人要說，《新民叢報》是1902年康梁保皇黨人在日本橫濱創辦的一份報紙，實際主編人和主要撰稿人是梁啓超沒有錯，但這裡提到的“《新民叢報》記者”，真是指梁啓超嗎？不着急，請看黃文的下半段：“張之洞自調署江督以來，忽以魏光燾調補，既無后命以飭回本任，又無別缺升遷；近復以濫借外債，傷損國權，被當道彈參，吉凶莫保。是張進退無據，俯仰無依，欲求有以彌補而冀圖得缺者，必以要結榮祿爲第一法門。蓋《新民叢報》之記榮祿事，亦無分毫掩飾也。欲結榮祿，必仇梁啓超。苟仇梁啓超不得，又勢必仇《新民

叢報》。或者他日回京，可作獻媚相門之一助未可知也”<sup>\*8</sup>。關於梁啓超受業於陳梅坪先生門下之事，在《梁啓超年譜長編》里也得到了印證。該《年譜》引《曼殊室戊辰筆記》，謂光緒十二年（1886），啓超年“十四學於佛山陳梅坪先生”<sup>\*9</sup>。華南師範大學教授李育中先生1961年到廣東佛山調查時，亦“承當地老學人告知，梁啓超是與黃小配在佛山書院同過學”<sup>\*10</sup>。另據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知，佛山書院初創於清乾隆八年（1743）。嘉慶七年（1802）由佛山鎮柵下鋪遷至豐寧鋪衙旁街，始更名爲佛山書院。光緒年間，陳梅坪爲主講時人才最盛，內外課肄業者達二百余人。光緒十五年（1889）中舉者有十余人<sup>\*11</sup>。上引資料說明，黃世仲與梁啓超會同在陳梅坪先生門下受學，倒是確鑿無疑的事實。這樣看來，楊世驥的說法，很可能是聽信誤傳，張冠李戴，把康、梁二人的事情搞混了。

## 二、何時加入中和堂

中和堂的前身本爲日本橫濱一華僑工界之俱樂部，大約成立於清季戊戌己亥年間，初無正式名稱。后經革命黨人陳少白、尤列改造，漸成爲孫中山領導的革命組織興中會的外圍團體，並正式命名爲中和堂。20世紀初年，尤列下南洋以后，又在吉隆坡和新加坡等地建立了中和堂組織<sup>\*12</sup>。黃世仲早年究竟於何時在新加坡加入中和堂呢？因爲這件事，既是黃世仲人生旅途的重要轉折點，又是黃世仲後來成爲革命派小說家的政治思想基礎和前提條件，也不能不搞清楚。由於過去人們不清楚尤列在南洋創立中和堂的確切時間，不清楚黃世仲與《天南新報》關係的詳情，學者們多根據馮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逸史》2集《洪秀全演義作者黃世仲》二文的說法<sup>\*13</sup>。不約而同地定在了1901年<sup>\*14</sup>。隨着對黃世仲早年在南洋活動資料的蒐集與整理，尤其是隨着對黃世仲與《天南新報》關係以及發表在《天南新報》上文字的系統研究<sup>\*15</sup>，現在看來，上述幾乎衆口一詞的說法，實在是大謬不然。

第一，現已查明，1902年7月18日，黃世仲在新加坡保皇黨人邱菽園創辦的《天南新報》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10天后，即1902年7月29日，該報第一版刊載“添延主筆”告示，正式宣布聘用黃世仲爲該報主筆<sup>\*16</sup>。熟悉中國近代歷史的人都知道，中和堂的實際創始人陳少白、尤列，皆爲激進的革命領袖，早在興中會成立之前，他二人就與孫中山、楊鶴齡聚集在一起，“高談造反討滿”，被人稱之爲“四大寇”<sup>\*17</sup>。后来尤列在南洋創立中和堂，也是旗幟鮮明，毫不含糊，其堂所“樓頂高懸青天白日旗，揭橐革命排滿，至爲明顯”<sup>\*18</sup>。如果說，黃世仲早在1901年就已加入以“革命排滿”爲宗旨的中和堂，何以會在1902年7月又進入維新保皇派掌控的《天南新報》

出任主筆，並發表一些具有明顯的維新改良傾向的文字呢？如果說黃世仲是迫於生計不得不那樣做的話，何以在《天南新報》的後半期，黃世仲又發表了不少具有鮮明革命色彩的言論呢？黃世仲1901年加入中和堂的說法，對這些現象都是無法解釋的。

第二，從尤列在新加坡創立中和堂的時間看，黃世仲在1901年加入中和堂根本不可能。據可靠資料分析，尤列1901年在新加坡創立中和堂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因為根據日本外務省檔案——明治34年4月20日神奈川縣報（祕甲第122號）記載，尤列離開日本橫濱口岸去新加坡的確切時間是1901年4月20日\*<sup>19</sup>。以當時的航船速度，再加上中途幾次必要的停泊補給，一般也要一兩個月時間才能抵達。估計尤列到達時已進入6月份，況且當時南洋的形勢對革命派很不利，“時南洋各埠保皇黨聲勢鼎盛，閩商邱菽園及粵商七家頭朱子佩等，咸為康梁張目。尤初至，不敢公然向商界談革命，乃漸以國醫術受知於工界及下層社會，且常涉足煙館賭場中，借煙賭以鼓吹革命排滿。久而久之，收效漸宏。繼遊吉隆坡、檳榔嶼、霹靂、柔佛諸埠，從之者日衆。於是首創中和堂於吉隆坡，其會所高懸興中會之青天白日旗，隨風招展。……自是英屬各小埠亦陸續有中和堂之設”\*<sup>20</sup>。這說明，南洋中和堂的創立，是尤列下南洋后從零做起，經過較長時間的經營準備才成立的。到底經過多長時間的準備呢？馮自由在《華僑革命開國史》里說是“經營半載”，有了相當基礎，才做效橫濱中和堂的辦法創立的\*<sup>21</sup>。從前引資料還知道，新加坡中和堂的創立又晚於吉隆坡。這樣算來，新加坡中和堂的創立，最早恐怕也在1902年的上半年了。因此，黃世仲在1901年加入中和堂的說法，根本經不住推敲。

第三，如果再對黃世仲發表在《天南新報》上的文章作點具體分析，很容易看出黃世仲思想轉變的軌跡大略，也可以約略推斷出黃世仲在新加坡加入中和堂的大體時間。概而言之，黃在《天南新報》期間（1902.7~1903.3）的思想傾向，大體可分為前后兩段：1902年12月以前，維新改良的思想傾向比較明顯；從12月開始，革命的色彩則非常鮮明。譬如：9月10日的一篇文章說，“嗚呼！今而后支那守舊之團體結矣，今而后支那維新之生机戕矣！”\*<sup>22</sup> 10月11日的一篇文章又說，“殘國民者，國民也，非朝廷也”\*<sup>23</sup>。11月18日的文章又說，“登十九、二十世紀之舞臺，問何以為國家扶危救命之朱符，豈非派遊學耶？……豈非興鐵路耶？……”\*<sup>24</sup>。這些言論和康梁的主張實無本質區別，仍是教育救國、實業救國那一套。及至12月1日發表的《說亂》（續）篇中，革命的思想就非常的鮮明了。他說，“吾敢正言以告之曰：亂於文明之世者為反，亂於腐敗之世者為義。使時當亂而不亂，是坐視斯民於水火之間，而不為之拯救，此逸民忘國者流，湯武等所不為也。使湯武拘於君臣之分，不欲以亂自居，

則夏商之末，其殘虐不知止於何時耳” \*25。如果再聯系到甲午戰后，尤其是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及《辛丑條約》簽訂后，不少知識分子對腐敗衰朽的清王朝完全喪失信心的背景因素，就很容易看出，這篇政論顯然是在借對造反作亂的具體分析和正名，號召人們起來，效法商湯周武，行正義之舉，推翻腐敗的清王朝，救人民於水火之中。不過，黃世仲12月4日發表的《論中國維新之變局》，在揭批清廷假維新的基礎上，又申述了自己的維新主張，說“吾所謂維新者，其點猶有進焉，亦衆所共知之民權是已。蓋專制者必不維新者也，維新者必不專制者也” \*26。這裡，黃世仲雖然還是在討論、宣揚維新，但已經注意將自己的維新主張和其他人的維新主張加以區別，重點強調“民權”而反對君主專制。說明黃世仲的思想確實在轉化。同時也說明，人的思想的轉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總要有一個過程。12月16日發表的《論今日中國少年之責任》，黃世仲則公開主張，中國少年要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必先有不惧爲史堅如、唐才常之心而后可也” \*27。人所共知，唐才常固爲擁護光緒帝當政，組織自立軍，欲起兵“勤王”而慘遭張之洞殺害的維新志士；而史堅如則爲力主武裝反清的興中會會員、1900年因刺殺清兩廣總督德壽而英勇就義的革命烈士。黃世仲敢於在報端公開號召中國少年學習史堅如，其激進的革命態度不難窺見。所以，黃世仲1903年3月25日在《天南新報》發表的最后一篇政論《論張之洞之禁新民叢報》文中，說他與維新派代表人物梁啟超“所謀各異，志向亦殊”，也確爲實事求是之論。由以上情況推斷，黃世仲加入中和堂的時間，似應在出任《天南新報》主筆數月之后。馮自由在《革命逸史》里說黃世仲以“《天南新報》記者”身份，“加入中和堂爲會員” \*28，“遂亦傾心民族主義” \*29，是符合實際的。《革命逸史》第3集《興中會時期之革命同志》一文，以列表的形式，清楚地標明了興中會時期諸革命同志的姓名、籍貫、職業及加入革命組織的時間，其中把黃世仲等人加入中和堂的時間，明確地標注爲“壬寅”年\*30，即1902年，也是完全正確的。只可惜這條史料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31。

根據以上分析考辨，我們認爲，黃世仲加入中和堂的大體時間當在1902年初冬，即11月到12月之間。隨着黃世仲政治思想由保皇維新到革命排滿的轉變，他後來離開新加坡保皇派主辦的《天南新報》，回歸香港就任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的記者（后爲主筆），就成了符合邏輯的必然選擇。至於有人把黃世仲參加的中和堂說成“三和堂”之誤，早已有學人指正\*32，這裡就不再重復了。 囧

【注釋】

- 1) 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之“《鏡中影》提要”，書目文獻出版社1982年版。
- 2) 錢仲聯主編《中國文學大辭典》“黃世仲”條，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年版。
- 3) 六省市十一院校合編《中國文學簡史》下冊，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48頁。
- 4) 7) 楊世驥《文苑談往》第1集，上海中華書局1945年版。
- 5) 郭天祥《黃世仲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 6) 此處所言這兩部書，均據廣州孫中山文獻館珍藏之善本。
- 8) 張克宏編《黃世仲黃伯耀弟兄南洋詩文集》，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2001年版，第104-105頁。
- 9) 丁文江、趙豐田編《梁啟超年譜長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頁。
- 10) 李育中爲方志強《黃世仲大傳》所作之“序言”，參見方著《黃世仲大傳》，香港夏菲爾國際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7頁。
- 11) 劉伯驥《廣東書院制度沿革》，長沙商務印書館1939年版。
- 12) 馮自由《中和堂小史》，見馮著《革命逸史》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28-136頁。
- 13) 馮自由《革命逸史》第2集《洪秀全演義作者黃世仲》一文說：“庚子辛丑（1900至1901）間，尤列創設中和堂於南洋英屬各埠，工界從之者如歸市，世仲弟兄預焉。《革命逸史》初集《尤列事略》謂：“辛丑后尤至南洋，……組織中和堂於星洲及吉隆坡、……《天南新報》記者黃世仲、黃伯耀、康蔭田亦加入中和堂爲會員”。
- 14) 如顏廷亮《黃世仲生平諸問題小辨》，載《近代文學史料》，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管林、鍾賢培主編《中國近代文學發展史》（修訂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4年版；關志昌《黃世仲傳略》，載《香港筆薈》第11期，1997年3月香港出版；《陳平原小說史論集》（中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歐陽健《晚清小說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等等。
- 15) 幾年前，友人張克宏博士留學新加坡期間，曾用很大的精力，對黃世仲早年在南洋活動時期留下的文字資料做過全面系統的蒐集與整理，發表了《黃世仲與天南新報》（載《黃世仲與辛亥革命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2001年出版）等論文，整理出版了《黃世仲黃伯耀弟兄南洋詩文集》（香港紀念黃世仲基

金會2001年出版)。爲學術界進一步研究黃世仲提供了極大的方便。

- 16) 郭天祥《黃世仲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頁。
- 17) 28)《革命逸史》初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27頁。
- 18) 29)《革命逸史》第2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41頁。
- 19) 轉引自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册)，中華書局1991年版，第268頁。
- 20) 30)《革命逸史》第3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30、76頁。
- 21) 馮自由《華僑革命開國史》，參見近代史資料專刊《華僑與辛亥革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頁。
- 22) 23) 24) 25) 26) 27) 張克宏編《黃世仲黃伯耀弟兄南洋詩文集》，香港紀念黃世仲基金會2001年版，第29、46、63、70、72、77頁。
- 31) 馮自由《革命逸史》，凡6集，寫於1939-1948年，歷時近10年。作者一邊寫作，一邊在報刊發表。后又分數次結集出版。故對同一件事的說法間有矛盾之處。
- 32) 關於黃世仲“加入興中會的外圍組織——三合堂”的誤說，實出自楊世驥《文苑談往》第1集《黃世仲》一文，后爲不少學人所承用。此誤顏廷亮先生曾在《黃世仲生平諸問題小辨》一文中有考辨。別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之《近代文學史料》。

(GUO Tianxiang)